

五四以来，中国学者对近代中国何以落后于世界这一“李约瑟难题”，从所谓民族劣根性层面提出种种解答，似未抓住这一中国症结的根本，尚需深入思考

民族劣根性之源 民主精华的传承 小农经济的脆弱 民是最大的生产力

中国症结

降大任◎著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社会出版社
China Society Press

中国症结

降大任◎著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社会出版社
China Socie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症结/降大任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5087 - 3695 - 2

I. ①中… II. ①降… III. 社会问题 - 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①D693.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3813 号

书 名: 中国症结

著 者: 降大任

责任编辑: 刘云燕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 编辑部: (010) 66064025

邮购部: (010) 66060275

销售部: (010) 66080300 传真: (010) 66051713

(010) 66051698 传真: (010) 66080880

(010) 66080360 (010) 66063678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55mm × 225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自序

这是一本读书和研究的心得,大约耗费了我十年的工夫。

这本书里要探讨的是近代中国为什么发展慢的问题,但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不多涉及外部的国际因素。这样的问题,有识之士论述已很多,著者对之有取舍,也有发挥。虽也引述别人的言论,但也说自己想说的话,希望能将复杂的问题,讲得尽可能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破解要害,力求以小册子说明大问题,并有所创见。只是不敢视为定论。或许其中的一孔之见,有助于研究的深入,以推动民族进步和中华复兴事业。著者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个学习者、读书人,限于学识水平,书中定有谬误,愿意听到同道的批评指正。

降大任
2011 年春

启 子

五四以来，中国学者对近代中国何以落后于世界这一“李约瑟难题”，从所谓民族劣根性层面提出种种解答，似未抓住这一中国症结的根本，尚需深入思考

引 言 / 3

① 所谓“李约瑟难题” / 4

② 对若干解答的质疑 / 6

③ 所谓民族劣根性 / 7

民族劣根性之源

并非所有中国人都有所谓“民族劣根性”，只有历代暴虐的帝王官匪及在“帝王崇拜论”影响下产生的民间匪类才集中体现了民族劣根性的恶德。官匪与民匪，二匪交攻，直接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迟缓和落后，使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呈现出治乱循环的特征。中国农村的广大农民与士人是历史文明进步的推动者，是民族劣根性的抗拒者和抵制者，但他们未能成为历史的发展的决定性主体

④ 历代帝王的劣迹与帝王崇拜论 / 13

⑤ 关于游民、匪类、暴民 / 18

⑥ 中国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 / 23

⑦ 暴虐的帝王官匪 / 29

⑧ 造反者中的民间匪类 / 34

⑨ 民匪的从众作恶心理 / 41

⑩ 官匪与民匪的共性 / 44

民主精华的传承

先秦原儒是远古民主制的继承者，与汉以后的奴儒具有不同的性质。原儒的民主理念在汉代以后被曲解、遮蔽并边缘化，成为在帝王文化高压下不绝如缕的潜流，坚韧地抵制、反对着帝王文化的暴政和民间匪类的作恶

- ⑪ 关于儒学的辨析 / 49
- ⑫ 原儒的民主理念 / 50
- ⑬ 儒学溯源与以民为天 / 54
- ⑭ 士文化 / 60
- ⑮ 帝王文化 / 62

小农经济的脆弱

皇权专制下脆弱的小农经济基础是官匪与民匪产生的社会土壤。而小农经济的长期延续性是由中国独特的自然条件决定的。但小农经济的自足性使其只能被动地接纳世界近代的进步文化，这与西欧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产生的历史进程大不相同，这就拉开了中国与欧美历史进步的差距。彻底改造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是消除官匪与民匪这一民族祸害，从而破解近代中国落后的症结的根本途径

- ⑯ 皇权专制下的小农经济基础 / 67
- ⑰ 小农经济的长期延续性与中国特定的自然条件的关系 / 69
- ⑱ 自然条件决定论的限度 / 71
- ⑲ 小农经济的自足性 / 75
- ⑳ 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式创新 / 84
- ㉑ 自然条件与前资本主义时代 / 86
- ㉒ 西欧资本主义率先产生的原因 / 88
- ㉓ 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差异 / 91

结论

20 世纪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了破解中国症结的大幕，重温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述，重新思考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内涵，全面改造小农经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执政为民，还政于民是彻底消除匪祸，完成中华复兴大业的唯一正确选择。这民，才是最大生产力

②4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消除匪祸 / 97

②5 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 / 99

②6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 104

②7 关于小农经济改造 / 109

②8 民主是最大的生产力 / 111

附录

一、自古帝王多流氓——读周良霄《皇帝与皇权》 / 115

二、辜鸿铭：“在德不在辩！” / 120

三、慎勿妄动手指头 / 125

四、先秦儒家的民主理念 / 127

五、关于先秦民主若干问题的辨析 / 139

1. 原儒定性 / 139

2. 先秦民主 / 142

3. 人权个性 / 145

4. 以民为天 / 148

5. 法治为辅 / 152

6. 仁者无敌 / 155

7. 劳心劳力 / 158

8. 孝为人本 / 161

9. 直面人生 / 164

10. 中庸变通 / 167
11. 权变之道 / 171
12. 止于至善 / 174
13. 盗憎主人 / 177
14. 秦皇变态 / 180

启 子

五四以来，中国学者对近代中国何以落后于世界这一“李约瑟难题”，从所谓民族劣根性层面提出种种解答，似未抓住这一中国症结的根本，尚需深入思考

引言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

位卑未敢忘忧国。

——陆游诗句

中国的强盛，是中国人的期盼，亦是世界人民之福。中国没有以暴力侵侮别国的历史劣迹，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国和周边民族打打杀杀相冲突的事情不少，但中国军队主动出境征伐别族的事情极为罕见。相反，中国总是同邻邦友好相处，但求天下太平、互利共赢。中国人口众多，为世界之冠。中国现今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举足轻重的力量。

中国强盛是地球人的福音。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民族都希望中国强盛，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也理应强盛，理应对全人类作更大的贡献。

遗憾的是中国现在还不够强盛，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差距甚大，中国需要全民奋发，奋起直追。

① 所谓“李约瑟难题”

时下，值得人们，首先是中国人思考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还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强盛？

其实，这样的问题百年来早已有人提出。

人所共知的，1938年英国科学史研究者李约瑟先生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其时，李约瑟说他在写那本关于中国科技史的专著，“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自然杂志》第13卷，1990年第12期）这便是有名的“李约瑟难题”。

事实上，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李约瑟先生之前也提出过同类的问题。友人谢泳先生在他所著的《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中揭示“李约瑟难题”可能来源于吴景超的推断。吴景超曾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的友人。1949年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他在1935年出刊的《独立评论》162号上发表了题为《论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一文，文章认为“中国发明的成绩，所以不如别人，乃是因为文化基础薄弱，而非由于民族的智慧有什么欠缺”，文章分析中国文化基础薄弱的原因是：“中国过去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太差，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文章提问：“中国为什么缺乏发明的文化基础？这个问题如换一个问法，便是中国为什么缺乏自然科学？”作者对此作出两点回答，“第一便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在这个上面……中国自西汉以后，知识分子的心力，都用在儒家的几部经典上面”；“第二是我们的自然科学所以不发达的原

因，乃是由于我们在建筑文化基础的过程中，受别的文明国家的益处太少”。意思是，中国之落后是因为过去交通不便，中国与欧洲文明接触少。而欧洲各国彼此距离近，交流多，便于相互吸收文明成果，所以进步就快。

由上可知，吴景超不仅提出过近代中国落后（主要是自然科学落后）的问题，而且追溯了近代之前西汉以后的历史原因，那就是中国人历来不重视发展自然科学，而且又缺乏吸收别国（主要是欧洲）文明成果的条件。

谢泳书中还提及费孝通、张东荪二位学者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

谢泳介绍说，费孝通的看法还不是对问题的直接解释，而是一个有价值的思路。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注重对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调协，却忽视了这种调协的人和自然这一基础。中国知识分子对以自然知识和技术为重心的西洋文化是外行，“不只是外行，而且瞧不起那一套”。谢泳说，费孝通的看法与吴景超大体是一致的。

张东荪的观点是，中国的古人在认识上偏重于事，不注重物，“只偏重于历史而不发生有科学”。从历史看，“中国根本上没有因果观点的科学文化，但却确有辩证观点的史观文化”。“由于中国自有其固有的一套文化，而在这一套文化上，中国人不必更换观点却能应付其环境，则便不生有创新的需要。所以外国学者批评中国文化有自足性，想来就是因为如此”。

张东荪是用哲学观点看问题的，用语不免武断，却也不是没有某种事实依据的。类似的观点，在学术界还有一些，比如谈中国古人不擅长逻辑思维，惯用具象（形象）思维；中国人思想重综合，不善分析；重模糊思维，不重精确概念；等等。有关讨论的专书见刘钝、王扬宗主编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

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所举诸说，各是其所是，读者自可参阅，兹不再述。上列吴、费、张三位均系大家，其所说颇有讨论的价值。

② 对若干解答的质疑

吴景超、费孝通、张东荪三位先生的见解，不约而同谈到的是文化问题，属于文化史观。其中正确的地方，在着眼于从自然科学即科技的不发达来解释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决定社会生产力提高的程度，而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决定社会文明进步的快慢。这个观点，如今已是学术界的共识。

那么，相比较西方而言，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科技不发达呢？从漫长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历程看，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水平并不低，甚至可以说曾经领先于世界，有过辉煌的成绩。且不说令国人自豪的四大发明，更有李约瑟的那部《中国科技发展史》的巨著全部内容可为铁证。

这个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古人并非像吴景超所言是西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在自然科学上面，而只用在儒家经典上。吴景超的第二点意见，归因于古代中西交通不便，也不是正解。古代中西交通不便是事实，然而就在这样的局限中，古代中国创造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也是事实，这又如何解释？

如果说古代中国的文明成就了不起，只是近代落后了，那么按吴景超的说法，何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较之古人突然就不注重科技发展了呢？他们为什么较之古人智商下降了呢？吴景超又说这本来不是什么民族的智慧有什么欠缺。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至于中西交通问题，近代肯定比古代便利多多，为什么交通便利

了，中国的科技发展反而却显落后呢？显然，吴景超的见解尚需斟酌。

费孝通的思路与吴景超相类，他直截了当地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科技知识是外行的缘故。诚然，中国古代儒、道、释诸家不少人士不重视或看不起科技创新活动，但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和民众都是这样。费先生的观点显然也是片面的。科技的进步必然带来新的物质利益，这是不以看不起科技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律。中国人无论古代、近代、现代都不会弱智到拒绝先进科技的，少数人的意见包括帝王的旨意都改变不了这个社会潮流。笼统地说有知识分子看不起科技就能阻挡社会的文明进步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张东荪说中国没有科学文化，只能理解为中国近代科学文化不发达，这种不发达也反映在中国人逻辑思维不发达等方面。这里面的原因倒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为什么近代中国科学文化或曰科技活动不发达？张东荪认为，原因即外国学者指出的中国文化有自足性。

这个见解很对。是的，中国文化确有自足性，自成一套，自我满足。既然自足自满，就不需要主动地从外部输入新东西。

在这里，恰恰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国文化，确切地说是20世纪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会有自足性？对此，张东荪没有深究。所以，他的见解虽然合理，却探讨得不够彻底。

而这，才是我们应当思考的出发点。

③ 所谓民族劣根性

对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还有更多的学者进行了广泛

探讨。从梁启超开始，五四前贤参与者甚众。许多中外学者，其中不乏思想敏锐的思想家，几乎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揭示中国人的民族性、国民性的劣根性问题上。

这似乎确实成为一个大大的问题了。

民族性、国民性就是人性，确切地说是指人的文明素质。这关乎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人是科技的主体、掌握者，人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从人的素质探讨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似乎才能抓住中国问题的症结。

关于民族劣根性之反思与批判，不能不谈到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及其一系列杂文。但在鲁迅之前，就有鲁迅提到的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中文译名明恩溥）所著的《中国人的气质》（鲁迅译名为《支那人气质》，见鲁迅《立此存照三》），其他中外学者亦就此作过生动的论述。史密斯之书曾在1890年上海的英文《北华捷报》上连载，后结集于纽约出版。书中列举中国人的特点，如：注重面子和善于做戏；过度节约；勤劳刻苦但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思绪含混；坚韧，善于忍耐却缺乏同情心；相互猜疑而缺乏诚信；极端迷信，谣言泛滥；等等。凡二十六种毛病。史氏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人贫困和无知造成的，同时也由于中国人过度依赖历史经验，而且没有同更优越条件的国家相对比，从而导致眼界狭窄。当然，史氏也指出上述特点不独为中国人独有，如印度人也有。

史密斯之后，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严复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发表名文《原强》，直揭中国“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严复另有一文《辟韩》尖锐指出是专制君主制造了民众“弱而愚”，“士大夫心术之坏”也是造成民智低下的根源。又在《〈法意〉按语》文中指出中国人自私，原因是小人没有参与国家和社会之事的机会。严复留学西方，自然了解西方

的民主政治，但他对改造中国人的劣根性表示悲观：“所绝不敢相信者，以中国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在。”就是说，在中国难以改造社会制度，也就难以改变国民之劣根性。

继严复之后，有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中国积弱溯源论》，论中揭示中国人的缺点为“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认为这是统治者的政术对民众愚弄造成的。次年（1902年）梁启超发表名文《新民说》，指出中国人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是由于“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1903年梁氏又作《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亦罗列中国人的缺点加以批判。到辛亥革命时期梁氏的观点有所改变，对国人性格不再一概痛斥，而有良与不良之分析，显得略为客观。

革命家孙中山一生坚持排满反帝和民主政治奋斗，他痛感国人有帝王崇拜之病，如认为太平天国垮台，“败在众王都争做皇帝”。这一点明显地与维护帝制的严复、杨度等人不同（参见《孙中山选集》，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55、678页）。

共产党人陈独秀也认为，由于几千年来帝制专政，使“吾国民遂沉迷利禄而不自觉，卑鄙齷齪之国民性由此铸成”（《我之爱国主义》）。李大钊指出中国人的两大缺点，一是凡事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喜欢一哄而起；二是任力不任法。归因“是皆专制制度之余毒”（《立宪国民之修养》）。

同情共产革命的鲁迅对国人劣根性的揭示洞察深刻，其名篇小说《阿Q正传》所描绘的愚昧农民阿Q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周作人语，见其《关于〈阿Q正传〉》一文）。在鲁迅的大量杂文中，揭示中国人奴性、愚昧、非理性、保守、自私、贪婪、自大又自卑、冷漠、无耻等恶德不遗余力，但鲁迅同时也承认中国人并非都是劣种，历史上从来就有“舍身求法”、